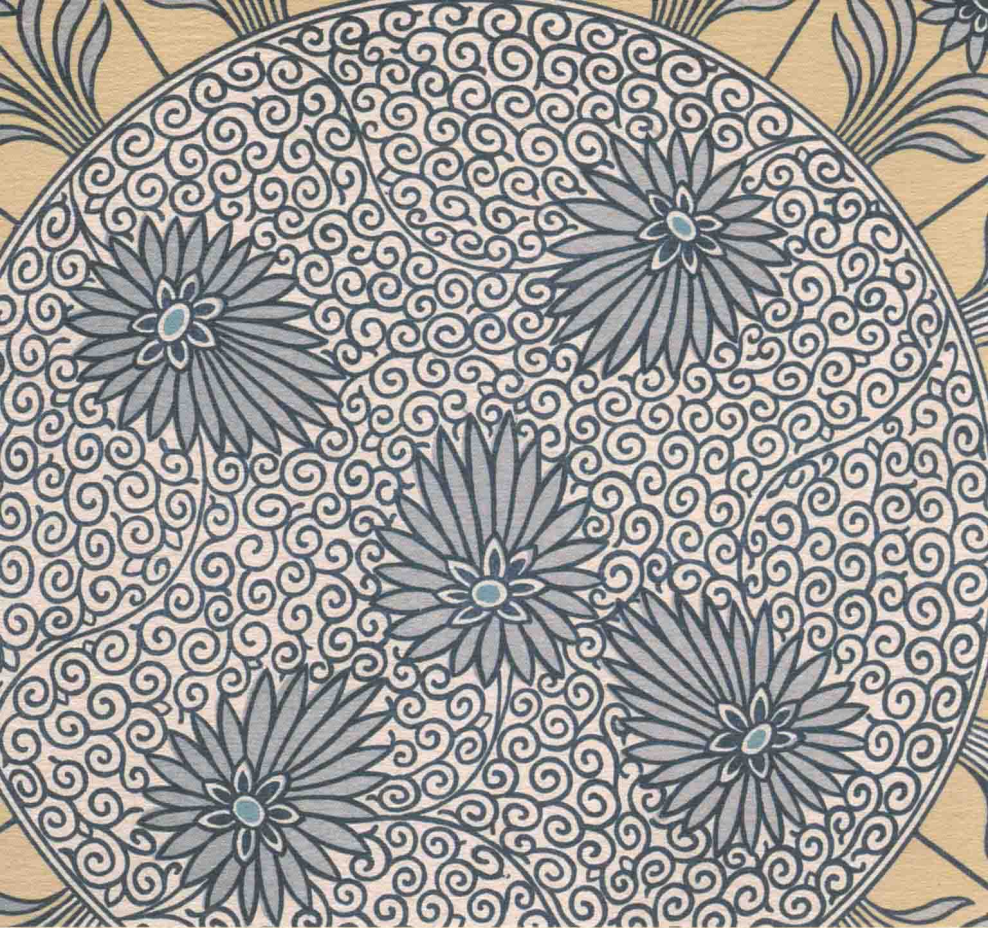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 / 当代文学理论系列

丛书主编 张一兵 副主编 周宪 周晓虹

J. Hillis Miller

An Innocent Abroad:
Lectures in China

萌在他乡：
米勒中国演讲集

[美] J·希利斯·米勒 著 国荣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当代文学理论系列
丛书主编 张一兵 副主编 周宪 周晓虹

萌在他乡： 米勒中国演讲集

[美] J·希利斯·米勒 著 国荣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萌在他乡：米勒中国演讲集 / (美) J·希利斯·米勒著；国荣译. —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10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 / 张一兵主编)

书名原文：An Innocent Abroad: Lectures in China

ISBN 978-7-305-17405-6

I. ①萌… II. ①J… ②国… III. ①米勒, J. H. — 演讲—文集 IV. ①K837.125.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88394 号

An Innocent Abroad: Lectures in China

By J. Hillis Miller

Copyright © 2015 by J. Hillis Miller

First published 2015 by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6

By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10-2016-091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出 版 人 金鑫荣

丛 书 名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

书 名 萌在他乡：米勒中国演讲集

著 者 [美]J·希利斯·米勒

译 者 国 荣

责任编辑 郭艳娟

照 排 南京南琳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965 1/16 印张 26.25 字数 353 千

版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17405-6

定 价 65.00 元

网址: <http://www.njupco.com>

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njupco>

官方微信号: njupress

销售咨询热线: (025) 83594756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总序

自晚清曾文正创制造局,开译介西学著作风气以来,西学翻译蔚为大观。百多年前,梁启超奋力呼吁:“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子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时至今日,此种激进吁求已不再迫切,但他所言西学著述“今之所译,直九牛之一毛耳”,却仍是事实。世纪之交,面对现代化的宏业,有选择地译介国外学术著作,更是学界和出版界不可推诿的任务。基于这一认识,我们隆重推出《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在林林总总的国外学术书中遴选有价值篇什翻译出版。

王国维直言:“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所言极是!今日之中国已迥异于一个世纪以前,文化间交往日趋频繁,“风气既开”无须赘言,中外学术“互相推助”更是不争的事实。当今世界,知识更新愈加迅猛,文化交往愈加深广。全球化和本土化两极互动,构成了这个时代的文化动脉。一方面,经济的全球化加速了文化上的交往互动;另一方面,文化的民族自觉日益高涨。于是,学术的本土化迫在眉睫。虽说“学问之事,本无中西”(王国维语),但“我们”与“他者”的身份及其知识政治却不容回避。但学术的本土化绝非闭关自守,不但知己,亦要知彼。这套丛书的立意正在这里。

“棱镜”本是物理学上的术语,意指复合光透过“棱镜”便分解成光谱。丛书所以取名《当代学术棱镜译丛》,意在透过所选篇什,折射出国外知识界的历史面貌和当代进展,并反映出选编者的理解和匠心,进而实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目标。

本丛书所选书目大抵有两个中心:其一,选目集中在国外学术界新近的发展,尽力揭橥域外学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最新趋向和热点问题;其二,不忘拾遗补阙,将一些重要的尚未译成中文的国外学术著述囊括其内。

众人拾柴火焰高。译介学术是一项崇高而又艰苦的事业,我们真诚地希望更多有识之士参与这项事业,使之为中国的现代化和学术本土化作出贡献。

丛书编委会
2000 年秋于南京大学

致 谢

首先,我要诚挚地感谢 Richard Terdman,我在加州大学的同事,正是他最早建议我为西北大学出版社的 FlashPoints 系列写一本书。他耐心地等了很多年,等我慢慢地把这本书攒起来,眼看着我“在中国的演讲”越积越多,才不时地礼貌地问一下。没有他的善意和支持,这本书就不可能问世。能在他的书系中出版,我感到尤为荣幸。

在这里,我也诚挚地感谢我在中国的那些朋友,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善良、好客和友谊。多年以来,他们为我做了大量的工作,不仅为我安排了那么多访问的机会,而且每次都照顾得那么周到。首先,我要感谢王逢振,早在我去中国访问之前,我们就认识了。那时候,他在加州大学厄湾分校做访问学者。多年以来,他给予了我很多方面的照顾。现在,他已经从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退休了,但是,我们的学术交流和合作还在继续。我要感谢的第二个人就是申丹。她是北京大学英语系的教授、长江学者。1988年,我第一次去中国访问的时候遇到她,现在,她已经是国际知名的叙述学方面的学者了。王逢振和申丹是我结识最早的中国朋友。接下来我要感谢的是王宁,他是清华大学外语系的教授、长江学者,也是享有国际盛誉的杰出的理论家。他为我安排了很多讲学机会,不仅仅是在清华大学,还有很多其他地方的国际会议。再接下来就是国荣了,现在我们也是多年的老朋友了。据权威消息,她在众多翻译我的文章的人中,做得最好。还有郭艳娟,郭艳娟的博士论文就是围绕我的著作而写的。在我编辑这部书的过程中,她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例如,本书英文版的“附录”就是她准备的,其中,包括很多细节,连我自己都记不清了)。这次,国荣和郭艳娟通力合作,促成了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本书的中文版,我真是觉得非常荣幸,也

非常感激她们两个人所做的努力。

接下来,我还要感谢一些人,这个名单肯定是不完全的,他们的名字顺序也是随机的。这些名字只是冰山一角,如我前面说的,很多细节连我自己都记不清了。这些学者对我都非常好,他们或者邀请我做讲座,或者采访我,或者为我提供客座教授的机会,或者翻译我的文章,或者撰写跟我有关的论文,或者在我的资助下,到厄湾做访问学者。他们是:金惠敏、夏艳华、秦旭(Daniel)、陶家俊、陈爱敏、宁一中、生安峰、盛宁、陆小红、李元、李作霖、陈永国、张一凡、黄德先、宫璇(Xuan Gong)、丁夏林、顾明栋、谢少波、王月和易晓明。看着这些学者在学术上的成长,我感到由衷的高兴。我与他们之间的联系,是我1988年之后学术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也感谢之前各个出版机构对本书中许多章节的出版。很多演讲的原稿早就遗失了,收入书中的许多章节是我从这些后来的出版物中一一找出来的。为了这本书的出版,我把这些稿件又逐一做了修订,加进去了很多现在的反思。这本书中出现的演讲,有些是原稿(如果我还有那些原稿的话),有些则是出版后的版本,这些版本一般会比演讲时用的稿子长一些。附录列出了这些演讲在成书之前发表的时间和地点。

第1篇是1988年5月我第一次访华的时候,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全院大会上所做的演讲。三年后,该演讲发表在David Easton和Corinne S. Schelling编辑的*Divided Knowledge: Across Disciplines, Across Cultures* (Newbury Park, CA: Sage, 1991),第118—138页。本书选用的版本已经在原稿基础上做了修改。

第2篇是1994年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做的报告,中文版发在外文所主办的刊物《外国文学评论》1995年第2期,第108—117页。这次演讲也是为了纪念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比较文学专业的副教授William (Bill) Readings。Readings毕业于牛津大学,是一位年轻而又才华横溢的文学评论家,不幸于1994年10月31日在飞

机失事中丧生。借此机会,我也希望,中国的同行们能够重视和关注这位英年早逝的理论家的思想。我的演讲中有很多地方借用了他的观点,特别是他生前几近完成的手稿,这部手稿于1996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书名是 *The University in Ruins*。现在看来,Readings 的这本书依然很出色,因为他对现在西方研究型大学的论述依然是最为公允的,而且,在众多关于西方大学之转型的书中,他的书依然是最好的。这篇演讲最早由 Tung-jung Chen 翻译,发表在《中外文学》月刊第24卷第1期(1995),第72—89页。本书收录的版本改编于我和 Manuel Asensi 共同编著的 *Black Holes/J. Hillis Miller; or, Boustrophedonic Reading* (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9)。有趣的是,这本书一面是我的 *Black Holes*,一面是 Manuel Asensi 的 *J. Hillis Miller; or, Boustrophedonic Reading*。

第3篇本来是香港中文大学的伟伦讲座系列,由香港大学出版社发表。1997年4月9日在北京大学演讲时,内容略有改变,两天之后,同一个题目又在中国社科院讲了。1998年11月,在哥本哈根大学和阿尔胡斯大学也就这个题目,做了演讲。哥本哈根大学文学研究所和阿尔胡斯大学比较文学系同时发表了这篇文章的“初稿”,题目是“Effects of Globalization on Literary Study”,在丹麦的演讲构成了本书第3篇的大部分内容,也有些段落源于我和 Manuel Asensi 共同编著的 *Black Holes/J. Hillis Miller; or, Boustrophedonic Reading*。

第4篇是2000年7月我在北京语言大学参加“文学理论的未来:中国与世界”国际研讨会时的主旨发言,后来,以“Will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urvive the Globalization of the University and the New Regime of Telecommunications?”之名,发表在《淡江评论》第31卷第1期(2000),第1—21页;另一个版本发表在 Lisa Block de Behar 编辑的 *Comparative Literature Worldwide: Issues and Methods* 第2卷 (Montevideo: Fundación Fontaina Minelli, 2000),第245—266页;同一个题目,后来又发表于 Q. S. Tong、王守仁和 Douglas Kerr 编辑的

Critical Zone 1: A Forum of Chinese and Western Knowledge (香港/南京:香港大学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第153—164页。

第5篇是2000年7月23—26日我在桂林参加“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现状与未来”国际学术研讨会时的主题发言。其中文版发表于《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第4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第24—34页。英文版发表于 *New Literary History* 第33卷第1期(2002),第1—20页。

第6篇是2001年4月17日首先在Baylor大学发表的,后来以小册子的形式,出现在该大学文学系,用于内部交流。几个月后,我又在清华大学举办的第三届“中美比较文学双边讨论会”上发表了这篇演讲,同期,在北京语言大学访问的时候,我也讲了这篇文章。其后,英文版发表在 *Lectures by Famous Teachers*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第28—62页;中文版发表在《文化研究》第4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第65—83页。

第7篇是2003年9月4日首先在清华大学讲的,后来,又在苏州大学讲过。中文版有几个版本,其中有一个版本出现在了易晓明主编的《土著与数码冲浪者:米勒中国演讲集》(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第3—27页。英文版似乎从来没有发表过。

第8篇最早是2003年9月9日在清华大学外语系讲的,2004年在郑州大学又讲过,只不过篇幅没有这么长。其后,发表于王逢振和谢少波主编的 *ARIEL* 特刊 *Globalization and Indigenous Cultures*,第34卷第1期(2003),第31—52页。后来,这篇演讲经过扩展和修改,发表在 W. J. T. Mitchell 和 Arnold I. Davidson 编辑的 *Critical Inquiry* 特辑 *The Late Derrida*,题目是“Derrida Enisled”,后来,又收录在我自己的两本著作中, *For Derrida* (纽约:Fordham大学出版社,2009)和 *The Conflagration of Community* (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11)。

第9篇是2004年6月5—9日我在郑州大学参加“全球化与本土文化”国际研讨会时的主旨发言,后来,又在清华大学2004年6月

12—15 日举办的“批评探索”国际研讨会上讲过。部分内容由郭英剑和张一凡译成中文,发表在《郑州大学学报》2004 年第 5 期,第 127—130 页。英文版在修改之后,成了我自己的书 *Communities in Fiction* (纽约:Fordham 大学出版社,2015)中的一个章节。

第 10 篇是 2006 年 6 月 16—22 日在武汉大学参加“文化研究与现代性国际高层学术论坛”时的主旨发言,英文版是首次发表。现在,大家对全球化已经没有那么热衷了,但是,在当时,对我来说,能与中国同行分享我的全球化思想,还是一件很高兴的事情。我在前面的讲演中,也涉及过全球化的话题,但是,这次会议的主题就是全球化,所以,我可以在不同的时空、不同的语境下,展开来讲我对全球化的看法。

第 11 篇是 2008 年 11 月 4 日我在南京邮电大学的演讲。英文版是第一次发表,不过,最后一部分改自我的文章“Reading (about)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in a Time of Globalization”,这篇文章发表在王宁编辑的 *Modern Language Quarterly* 特刊 *China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第 69 卷第 1 期(2008),第 187—194 页。

第 12 篇是 2010 年 8 月 11—15 日我在上海交通大学参加“第五届中美比较文学双边讨论会”时的主旨发言。特别要感谢王宁、陈静、生安峰在我逗留上海期间对我的照顾。在那次论坛之前,我就已经表达了我对所谓的世界文学的担忧(详见本书第 7 篇)。这一篇的内容是在我原稿的基础上扩展出来的;后面加上去的主要是对 Thomas Beebee 教授之发言的回应。会议发言以“Challenges to World Literature”之名,发表在上海外国语大学主办的《中国比较文学》杂志,2010 年第 4 期,第 1—9 页。之后,这篇演讲的修改稿又发表在王宁主编的 *Neohelicon* 特辑,即第 38 卷第 2 期(2011),*Comparative Literature Toward a (Re)construction of World Literature*,第 251—265 页(这本特辑刊登的主要是 2010 年上海这次会议的会议论文)。

第 13 篇是 2010 年 9 月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举办的“文学阅读与研究”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在这篇演讲中,我以叶芝的诗“The Cold

Heaven”为例,探讨了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是否应该阅读和教授文学的两难处境。这首诗也揭示了向学生讲解一首诗的困难,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其他国家。这首诗选自叶芝 1916 年的诗集, *Responsibilities*。该演讲的英文版发表于 Paul Socken 编辑的 *The Edge of the Precipice: Why Read Literature in the Digital Age?* (蒙特利尔/金斯頓:麦吉尔-皇后大学出版社,2013),第 140—155 页,以及 Jakob Lothe 和 Jeremy Hawthorn 编辑的 *Narrative Ethics* (阿姆斯特丹:Rodopi, 2013),第 13—24 页。

第 14 篇是 2012 年 9 月我在北京语言大学的演讲,英文版是第一次发表。

第 15 篇的原标题是“National Literatures in the Context of World Literature Today”,这是我 2012 年 9 月 10—12 日在北京访问期间,分别在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所做的演讲。在修改和扩展之后,以“Literature Matters Today”为题,发表在拉耶恩·郜施(Ranjan Ghosh)编辑的 *SubStance* 特辑 *Does Literature Matter?* 即第 42 卷第 2 期(2013),第 12—32 页;我非常感激郜施教授允许我对这篇文章进行修改,收入这本书中,并且,允许我把这篇文章翻译成中文发表。这篇演讲的第一部分由丁夏林翻译,发表在北京大学的《国外文学》2013 年第 2 期,第 3—8 页。

编者的话

理查德·特迪曼

事情总有转折点,也确实会变。*An Innocent Abroad* 就是对这一连串变化回应的结果——有些变化局限在当地,有些则是普遍的,具有时代特色,但是,所有这些变化都是具有挑战性的,相互关联,而且,互为因果。在这里结集出版的J·希利斯·米勒在中国的演讲,就记录了一个拥有国际盛名的美国文学批评家、理论家和学者对中国和美国之间的文化交流的反思和尝试,以及他立足于全球多样性和不同性的视角,对文学研究这个学科的思索。与此同时,这本书的出版也见证了一种别样的、尚在实践中的知识流通模式。我们收集出版米勒在中国的系列演讲,不仅是为了让世界各地的读者有机会一睹他的文采,也是为了促使人们在变换的时代思考书中所涉及的问题。

希利斯·米勒第一次到中国访问是在1988年,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后第十个年头。20世纪80年代标志着学术交流的开端,尤其是在1985年邓小平采取支持国际教育交流的政策之后。这一政策的执行,大大提高了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的数量,以及中国邀请美国学术界进行交流的次数。

希利斯·米勒是第一批受邀访问中国的美国学者之一,也是最有影响力的学者之一。为本书撰写了精彩“序言”的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教授,第一次到中国讲学,是在1985年。三年之后,米勒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全院大会上,发表了他的第一次演讲。由此,开始了他长达二十几年的中国之旅,本书收录的最后一次演讲是在2012年。

在某种程度上,这些演讲也从一个侧面记录了米勒二十多年来的学术轨迹。随着他对中国的理解不断加深,尤其是他对中国文化和学

术界的了解，他的演讲内容也逐步深化，他对历史、地域和比较文学这个学科的理解也呈现出一种螺旋上升的态势。

米勒的听众包括大学老师、学生、学者和艺术家。他向中国听众介绍美国文学研究发展历史的时候，正是美国学术界比较动荡的时期，各种理论思潮和方法不断涌现，尽管很多时候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所以，他的演讲也反映了他对文学研究领域这些变革所涉及的政治和文化议题的思考。米勒对这些问题的理解非常独到，而且，影响深远，尤其是在解构领域——所有这一切都见证了米勒一贯的高雅、博学、细腻和诠释的热情。

在西方，人们对“理论革命”的态度，有的拍手称庆，有的则嗤之以鼻，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些都是文学研究这个学科所必须走过的历程。对中国的文学研究者来说，这些来自远方的创新，甚至可以更加惊心动魄，因为中国学术界在文学史上盛产实证性的研究，意识形态往往决定了文本的解读。西方学术界带到中国的这些新观点显然已经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

就像那个时段出现在中国的其他西方学者一样，米勒也必须在自己的演讲中，小心翼翼地调试着他所要讲的内容与中国听众所熟悉的学术观点之间的距离。不过，这里收集的所有演讲绝对没有“降低标准”(level down)；相反，他把这种学术距离变成了自己反思的焦点，并把自己的学术观点深入浅出地剖析给未必认同他的中国听众。这就迫使米勒去做大量的阐释工作，他的阐释不仅清晰，而且，充满了洞见和原创性。这种持续的阐释工作也使他形成了一种潜质，那就是，他不仅能够有条不紊地把西方的文学研究展示给中国听众，也展示给西方的读者。人们甚至会忍不住疑惑，如果米勒没有跑那么大老远去演讲，他的那些独到的见解是否还会形成呢？

从这个意义上说，是全球化改变了人们对世界的诠释，这本书可以更好地帮助我们去理解这一点。然而，这本书也代表了另一种值得反思的转变，也就是图书出版的技术和实践。出版过程的物质性，以及学

者们交流和读者阅读的方式,都有着重要的影响。这些结构一直在变化,而且,在今天,变化得更快了。正像全球化对学术界的改变一样,在现阶段,知识传播的改变,也影响了学术的本质。大家不妨考虑一下,米勒这本中国演讲集是怎样成书的,又是以什么形式到达你手中的。

An Innocent Abroad (直译为《傻子在国外》或者《无知的人在国外》),显然是从马克·吐温那里借来的,米勒这种狡黠的、略带解嘲似的题目说明,我们每个人都已经在这个新世界里被异化了(denaturalized)。书籍也是如此。在人文领域,书籍是我们活动的中心内容;学术交流占了绝大部分。但是,这种生产正在被改变,它不仅体现在高级学术思考领域,而且,也体现在出版业赤裸裸的经济考虑。学术交流再也不是过去那种想当然的样子了。

这些发展的历史绝对不始自文学研究;它是伴随着自然科学领域的学报的成本上升而出现的。这些演讲所跨越的年代正是自然科学学报的订阅成本每隔几年就要加倍的年代。这些成本的上升是因为商业出版社购买了这些学报的版权,并把它们变成了以营利为核心。图书馆需要这些学报,因为科学家们需要它们。出版商则根据市场的承受程度,不断地提高他们的营利标准。

但是,在过去几十年,大学图书馆的预算却没有弹性增长。随着用来支付 Elsevier (*Cell* 杂志的出版商)以及 Taylor & Francis (*Molecular Physics* 的出版商)的份额的增长,留下来购买人文类书籍的钱自然就减少了。

相应的,学术型图书馆购买人文类图书的册数越来越少。学术型出版社能够卖出去的图书册数也越来越少,时间长了,在经济上也无法维持,以至于能够出版的图书越来越少,尤其是年轻学者的第一本书。许多学术型出版社干脆就不再出版人文类图书(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希利斯·米勒工作了 20 多年的加州大学。2002 年,加州大学出版社完全停止了文学研究类图书的出版,就连历史和哲学类图书也一并停止了)。

人文学科的学术阵地也在萎缩。但是,如果学者们的著作不能流通的话,他们怎么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呢?为了研究这个问题,诞生了高层委员会,由他们来推荐。但是,问题的核心是:他们不能大幅度地提高图书馆或者出版社的预算。为了省钱,他们提倡在非自然科学领域采取网络出版的方式。他们的第二个创新就是,建立非营利性的自然科学学报,如 *Public Library of Science* (缩写为 *PLoS*, 可译为“公共的自然科学图书馆”), 如此一来,图书馆支付的费用就大大降低了;以这种方式,购置预算也减轻了一点压力。第三,也是最相关的,就是,学者与出版社共同探索人文类图书出版的新路子。

文学研究中的 FlashPoints 系列,也就是米勒的书所在的书系,属于最早的、也是最勇敢的探索者。这一书系从 2007 年开始,它综合了三个方面的考虑。第一,找到它想出版的图书。FlashPoints 书系以大学文学研究圈子里的教授为依托。第二,因为“文学生产”越来越受到“文学”圈外的势力影响,尽管很少被感知到,所以,这个书系强调国际性和跨学科性(旨在扩大书系的读者群)。第三,FlashPoints 书系的纸质版图书和世界范围内免费的网络版同时面世。这也是这个书系的创新之处。不管是选题还是发行,FlashPoints 书系都是面向全世界读者的。

FlashPoints 书系选中希利斯·米勒这本演讲系列,就是看重了它的国际性和跨学科性。它们代表着文化的交集,探索了特别时刻的文化问题。书系编辑都认为,如果在出版这本书的同时,能够让全世界拥有互联网的人都能读到这本书,那该多好啊。而且,我们相信,这种开放性的图书出版会催生出更多像希利斯·米勒这样伟大的学者。事实也的确如此,所以,我们很欣慰。这也是这本书出现在你手上——或者你的电脑屏幕上,不管你在世界哪个角落——的原因。这种交流一定会持续下去。

英文版序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从1988到2012年,在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希利斯·米勒多次到中国访问和讲学,有时候,我甚至就坐在他的旁边。现在把这些演讲结集出版,不仅对他,对中国乃至美国的读者而言,都是一件幸事。这些演讲系列不仅构成了一道极为连贯的文学风景线,而且,也开启了一种崭新的、悦人耳目而又不同寻常的文学辩护模式。我们很难用传统的 Ingarden 或者 Käthe Hamburger 的美学体系来给它归类。当然,这些美学体系在当前的文学和哲学语境中,也早就不合时宜了;而且,我们也不必——事实上也同样不可能——概括米勒丰富的、异彩纷呈而又难以归类的学术生涯,那种所谓的从现象学到解构主义之类的泛泛而谈,对他来说,有失公允。至于说那些谴责理论和文化研究的国家学者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cholars,现在已经名存实亡),乃至至于恶意中伤的“左派”及其利益集团,我们就更没必要理会了,他们反对任何正当的美学诉求,千方百计地把我们从永恒的真理和伟大的书籍中吸引开去。

正是文学及其批评理论在今日的危机为米勒提供了一个契机,使他得以从一个广阔的视角来论述文学批评及其理论,也使得他对文学的“辩护”成为可能。当然,这些演讲的视角和策略也跟它们发表的语境息息相关,因为在国外发表演讲总是伴随着误读和危险;但是,在中国发表演讲又有些不一样,因为中国这些年的变化实在是太大了,以至于找不见北的教授们也许会讲出不合时宜的(如果没有居高临下的话)、已经过时的智慧结晶。对我们美国人来说,这些理论本来是欧洲的舶来品,但是,对中国人来说,这些“理论”就是美国人的,或者,至少

在比较新的时候，是；而我们再也没必要扮演传教士了。米勒的策略，即他缓慢而卓有成效的修辞性阅读，使他准确地抓住了中西方学者在崭新的因特网和全球化时代所面临的共同的困境和难题，因特网和全球化的联合，导致了阅读的变异，因为智能手机最终成了各种文本最后的“发表”归宿。实际上，后者在某种意义上成了语言被现在普遍盛行的视觉文化所消融的标志：媒介与感官之间的新的矛盾（如果传统的语言文学也能这样冲击我们的感官该多好啊），关于这一点，米勒在他的 *Illustration* 这本书中，已经巧妙地、令人难以忘怀地揭示过了，我把这本书当作他自己“文化研究”的宣言。

可以说，这些演讲展示了米勒所观察到的文学在一个更广阔的语境下所面临的困境，它把视觉消费和语言理解之间不可调和的紧张关系清晰地摆在了人们面前，而视觉消费与语言理解之间的张力只不过是一个更大的、更重要的、由来已久的矛盾中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特殊的、无关紧要的（生物学和神经认知）问题而已。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也许可以把这些内涵极为丰富的演讲当作一种巨大的能量的源泉。这些演讲从米勒自身的教学实践出发，充分体现了他在诗学方面的独创性（例如，从德里达的情书入手的那篇），全方位地探索了文学所面临的各种危机，其中点缀的一系列文学分析貌似不经意的，信手拈来，却每每都摄人心魄，令人欲罢不能（从托马斯·怀亚特到亨利·詹姆斯，再从马克思和普鲁斯特到康拉德的《诺斯特罗莫》，华莱士·史蒂文斯和美国的地域性特色就更不用说了）。除了这些独到的文学分析，我们还应该注意到他对哲学和政治这些既有共性又不乏个性的问题的透彻的理解，而这些都是最新的理论著述所关注和热议的重头话题。

尽管如此，问题的核心依然存在，而且，迫在眉睫：不是说文学是什么，而是它在全球化时代能否以一种大家都认可的方式存在下去，这个话题不仅跟文学有关，而且，也跟全球化密切相关。不过，米勒的智慧和丰富的教学经验已经把这个问题准确地写了出来：不是说人们将来是否会读书（哪怕是在他们的智能手机上也行），而是，文学研究中的哪

些东西会以传统的、现代的，甚至是未来的形式存活下来。这个问题已经超越了学术机构自身的问题（当然也不能把它们置之脑后），也不仅仅是被忽略的、“学者们”所担心的未来社会普遍的文化无知（cultural illiteracy）。“人文科学的危机”——这一非常专业的政治性焦虑——在这里，被一连串清醒的质疑表达了出来，例如，在英语之霸权下，“世界文学”所面临的重重危机，现有的众多语言（及其文学）不能以一种可行的、有效的方式被大家掌握。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关于这些话题的书的数量越来越多，然而，文学研究自身却开始越来越被边缘化了（无疑，文学研究只是起到了强化这个问题的作用）。

米勒的演讲也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各方面的有用信息，比如关于文学专业的设置和文学理论自身的历史、关于“文化研究”的争议、关于远程通讯工具对阅读和教学的影响，以及关于比较自身（例如，如何以西方各种批评理论和方法来衡量中国的文学研究等）。

也许，我们应该感谢米勒，他没有为这些困境提供解决的办法；那些解困之法最后往往被证明是某个人的一家之言，如果不是纯粹偏见的话。相反，米勒在这本非常睿智而又极具阅读性的书中，制造了问题（就像阿尔都塞们喜欢说的那样）；正是从这个问题出发，从探索其方法和后果出发，才产生了新的、富有创造性的思想。至于说，这个集子给我们带来什么安慰，那就是，文学及其文学研究总是处于危机之中，而这在我看来，反倒使其充满活力，而不是把它引向灭亡。文学及其文学研究总是处于危机之中，这个看似新鲜或者新奇的论点，却为它重新开启了与历史对抗的新篇章。